

試論朝鮮王朝大報壇創設之本末及其象徵意義

孫衛國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明朝滅亡六十週年後的1704年，朝鮮國王肅宗(1674–1720在位)在昌德宮後苑建大報壇，崇祀明神宗皇帝。英祖(1724–1776在位)將崇祀的對象推及明太祖和明崇禎皇帝，此後大報壇崇祀明朝三皇帝就成為朝鮮王朝朝廷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朝鮮國王在每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明崇禎帝忌日都要舉行崇祀大典，一直堅持二百多年，持續到1908年，迫於日本人的壓力，方才最後撤享。兩年後，朝鮮也隨之被日本吞併，李氏朝鮮滅亡。大報壇現在僅剩下零星遺存，¹而大報壇的歷史則有待深入研究。為甚麼朝鮮在明朝滅亡六十年後，卻要建壇崇祀明朝皇帝？其內外因素如何？為何竟堅持二百多年？作為一個外國王朝卻崇祀中國的皇帝，其間又有甚麼動機和理由？對於相關的問題，中韓學者已有過一些研究，²皆頗具創見，深受啟發，但尚需更為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於大報壇設置的原因、經過及其象徵意義更有待進一步探討，而大報壇的設置與當時朝鮮王朝內外政治、外交的關係，亦值得認真探討。

¹ 2001年8月11日，筆者參觀大報壇遺址，昌德宮管理處特別指派一名中文導遊小姐陪同參觀；可惜昌德宮的後苑(又稱秘苑)並未全部開放。筆者在後苑西北角發現一塊小小的標牌，標明大報壇所在地，並略有文字介紹。秘苑大部分是樹木，大報壇遺址上亦是古木參天，落葉尺許，絲毫看不出原來恢宏的規模。只是距標牌十餘步許，隱約可見數級臺階及兩蹲不大的石獅，算是僅有的遺存。

² 主要有王崇武：〈朝鮮大報壇史料匯輯〉，《學原》2卷7期(1948年11月)，頁60–74。這應是中國學者首次具體論述大報壇的文章，在學術上有開創之功。李光濤〈記朝鮮實錄中之大報壇〉一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1960年)；收入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頁831–49)，將《李朝實錄》中有關大報壇的資料匯編排比，略加論述，未附大報壇略圖。馮爾康〈朝鮮大報壇述論——中朝關係和中國文化傳播的一個側面研究〉一文(《韓國學報》第10期(1991年5月))則注重大報壇的祭祀儀節與文化的探討，從中看出中國祭祀禮節對朝鮮的影響。此外，于澎有
(下轉頁248)

肅宗之思明與大報壇創設之原委

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在經過最初一段磨合期後，與明朝建立了相互友好的宗藩關係。朝鮮以慕華、事大作為對明朝的基本策略和心態，明朝則以「字小主義」對待朝鮮王朝。³ 所以當1592年豐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鮮時，儘管明朝時當內憂外患相當嚴重之際，還是派大軍前往救援，歷經七年戰爭，1599年終於將侵朝日軍趕出朝鮮，使朝鮮「藩邦」得以「再造」。因之，在慕華、事大的心態下，朝鮮對明朝更增一種強烈的感恩之情。戰後不久，1626年和1636年，清朝兩次征討朝鮮，把朝鮮由明朝的藩國變成為清朝的藩國。但由於華夷觀的影響，儘管朝鮮政治上臣服於清朝，但內在文化心態上，朝鮮卻始終視清朝為夷狄，長期貶斥清朝。作為藩國，朝鮮王朝的正統必須來自宗主國中國的冊封和確認；⁴ 而對清朝的強烈不滿，使得朝鮮不可能接受清朝的正統。雖然表面上朝鮮必須接受清朝皇帝的冊封和賜予諡號，但內在心態上朝鮮從不以清朝所賜為意，⁵ 而必須以思明、崇明解決正統與現實中的政治危機。所以當明朝在1644年滅亡以後，感恩思明、尊華崇明，就成為朝鮮君臣上下的一種普遍心態。

〔上接頁247〕

〈大報壇與明清之際的中朝關係〉一文，載陳尚勝(主編)：《朝鮮王朝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13-59；鄭玉子亦有〈大報壇創設的相關研究〉，載《邊太燮博士花甲紀念史學論文集》(漢城：三英社，1995年)。鄭玉子在其《朝鮮後期文化運動史》(漢城：一潮閣，1988年)、《朝鮮後期中華思想研究》(漢城：一志社，1998年)和〈朝鮮後期享祀關係文獻資料之檢討〉，《奎章閣志》第16期(1993年)中，皆論及過大報壇。王崇武、李光濤的文章是資料匯編，馮爾康重在從禮儀制度、中國文化對韓國的影響等方面看待大報壇，于澎文則從中韓關係的角度看大報壇，鄭玉子文重大報壇創設經過的闡述。本文將大報壇作為整個朝鮮尊周思明的重要表徵來進行研究，將它置於朝鮮當時的大背景之下，對其創建原因及設立經過作一考證，並分析其象徵意義。

³ 關於朝鮮對明朝事大外交的研究，可參見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及其相關論文〈鄭夢周與朝鮮事大交鄰政策的淵源〉及〈權近與朱元璋——朝鮮事大外交的重要轉折〉，分別見《韓國學報》第15期(1998年)和第16期(2000年)；陳尚勝：〈論朝鮮王朝對明朝的事大觀〉，載陳尚勝(主編)：《第三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會議研討會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孫衛國：〈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南開學報》2002年第4期，頁66-72。

⁴ 參見孫衛國：〈朝鮮王朝尊周攘夷及其對清關係〉，《韓國學報》總第17期(2002年)，頁255-81；Michael C. Rogers,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the Trans-mural Extension: The Case of Chin and Koryo," *Korean Studies Forum* 4 (Spring-Summer 1978), pp. 1-22。

⁵ 即如諡號，朝鮮王朝宗廟內國王的牌位上，決無清朝所賜諡號的字樣，也不用清朝年號。

大報壇創設之原因

設立大報壇，最直接的動因是感恩思明。壬辰戰爭結束以後，宣祖大王(1567-1608在位)建造了宣武祠、武烈祠等來祭祀東征時主要的明朝將領。如果說明神宗出兵朝鮮，「再造藩邦」，那麼，在朝鮮人看來，具體執行神宗「再造」之恩的當歸功於石星、李如松與楊鎬、邢玠四人。石星當時為明朝兵部尚書，是明朝出兵拯救朝鮮的決策者和主要支持者。李如松乃壬辰倭亂時，收復平壤的功臣，是戰爭前期最為重要的明朝將領。楊鎬、邢玠則是丁酉再亂時保衛漢城、擊退日軍進攻的主將。因而戰後，他們四人成為朝鮮重點崇祀祭奠的對象。武烈祠崇祀石星、李如松及其部將，宣武祠崇祀邢玠、楊鎬。當時，以崇祀明朝將領為主，並未及於明朝皇帝，但已表露其感恩的心態，開啟崇祀的先聲。

明朝滅亡以後，這種感恩的心態就更為強烈。歷代國王對明朝「再造」之恩，始終念念不忘。朝鮮總以各種方式，表達其對明朝的感恩之情。李光濤指出，因為明朝援軍打垮了日本豐臣秀吉侵韓之眾，「再造藩邦」，朝鮮以德報德，故設立大報壇，加以崇祀。對於壬辰戰爭朝鮮受禍慘狀及明朝拯救之功，趙慶男在《亂中雜錄》中論道：「君父至於播越，宗社盡為灰燼，八道淪陷，萬姓魚肉。我國家堂堂赫業，殆乎不忍言矣。何幸人心思漢，天意歸周。官軍敗而義旅起，我師退而天兵至。始行薄伐，驅賊出境，疆場重恢，蜀駕還都。六月之師，恩莫重焉。」寥寥數語，將朝鮮受禍之慘狀和明朝的大恩大德勾勒出來。故而歷代朝鮮國王皆以感恩明朝作為其治國行政之首要。宣祖「啣恩感德，未嘗背西而坐，又大書『再造藩邦』四大字，以寓慕用之誠」。仁廟(1623-1649在位)之初，以斥和為事，君臣上下，專心一力，上尊皇朝，「雖婦孺亦知大義之不可化，大分之不可踈」。孝宗(1649-1659在位)之際，「喪亂雖平，冠履易置，朝野冤憤，愧恨謠吟，思明室而上方勵薪膽之志，斥逐頑鈍嗜利之輩，進用山林宿德之士，將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士皆欲執殳荷戈，有北首爭死之意」。⁶肅宗(1674-1720在位)認為明朝對朝鮮有「罔極之恩」，尤其強調壬辰「再造」之恩。認為「再造邦家」，「吾東方昆蟲草木，何莫非皇靈所被也」。⁷對於明朝之

⁶ 李光濤：〈記朝鮮實錄中之大報壇〉，頁832；趙慶男：《亂中雜錄》(漢城：大韓公論社，1977年)，〈敘〉，頁3下；《東稗》卷9〈事大〉，見鄭明基(編)：《韓國野談資料集成》第21冊(漢城：啟明文化社，1992年)，頁382；李義駿、成大中等(編)：《尊周匯編》，朝鮮事大斥邪關係資料集第一冊(漢城：驪江出版社，1985年)，〈義例〉，頁7-8。

⁷ 《李朝肅宗實錄》(東京：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卷39，肅宗30年正月庚戌，頁540。《李朝實錄》現通行的有兩個漢文版本，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印的《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年)和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刊行的《李朝實錄》，前者末附〈朝鮮王朝實錄總索引〉。另外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朝鮮與韓國就開始進行韓文翻譯，現皆已將實錄全部譯成韓文出版，並有電子版行世。朝鮮譯

大恩大德，他在〈感皇恩〉詩中寫道：「恩深再造感銘骨，效蔑絲毫負聖明；何日手提三尺劍，鐵騎長驅九連城。」肅宗想提兵長驅直進遼東，報讎雪恥，以求報答明朝皇恩。「醜虜腥塵何日掃，尊周大義幾時伸！」⁸但在現實中，他長驅直進的願望根本無法付諸實施，只得將強烈的感恩心態化作崇祀的行動。

可見，宣祖以後歷代朝鮮國王總是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明朝的感恩之情，而在明朝滅亡以後，這種情感更為強烈。肅宗建大報壇，正是朝鮮歷代國王思明感恩的繼承和發揚。他將這歷來感恩的傳統施諸祭祀，使之具體化、禮儀化了。大報壇的建成是朝鮮思明感恩禮儀化的標志，此後制度化、經常化的祭祀活動，可以使朝鮮思明情感得以表露和渲泄，成為朝鮮王朝其後二百餘年最為重要的祭祀大典。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朝鮮以崇祀明朝皇帝的方式，確立其政權的正統性。作為藩國，朝鮮的正統性來源於宗主國中國的確認。但在朝鮮人看來，清朝是夷狄而非中華，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屬，已經違背了朝鮮秉持的春秋義理觀念，朝鮮政權的正統性不可能從清朝獲得。而表面上與清朝的交往，派使臣請求冊封和請求賜予諡號，則變成了一種純粹應付清朝的外交手段。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得依從歷史傳統，唯有強化與明朝的關係，才能找到解決正統性危機的辦法。建廟崇祀明朝皇帝，既是感恩的表示，又是正統的象徵，可化解現實中的危機與矛盾。

宣祖之後，光海君(1608-1623在位)繼位。但明朝曾因為他是次子，十幾年間，不冊封他為世子；光海君取得了「權知國事」的資格後，又遲遲不冊封他為國王，令光海君心懷不滿。光海君繼位後，鑒於後金興起，威脅增加，於是企圖尋求一條既不得罪明朝、又不忤逆後金的辦法：暗中與後金往來，但是受到朝中猛烈攻擊，最終仁祖反正，將光海君趕下臺。光海君的兩面政策，雖然使朝鮮免遭一時兵災，但與傳統的事大主義相違背。明朝尚存，朝鮮不應當棄明而投金。朝鮮人把後金看作「夷虜」，光海君卻棄「中華」(明朝)而交「夷虜」(後金)，背逆了朝鮮信奉的正統觀，因而最終光海君被趕下了臺。從廢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種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統觀念，使得光海君無法為其宗室與大臣們接受：

〔上接頁249〕

本書名為《李朝實錄》，由(平壤)社會科學民族古典研究所翻譯，全四百冊，韓國1993年驪江出版社翻印。韓國由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和民族文化推進會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分工合作翻譯，九十年代全部完成。現在韓國任何一家大學圖書館都能在網上查到韓文電子版的《朝鮮王朝實錄》。本文最初在香港寫成，修訂於天津，用的是在香港和大陸通行的日本學習院版的《李朝實錄》，因此文中用《李朝實錄》而不用《朝鮮王朝實錄》的書名，以示版本之別。凡文中引用此書，一律以《李朝某宗/某祖實錄》相稱。

《大義編》，《朝鮮事大斥邪關係資料集》第四冊(漢城：驪江出版社，1985年)，前集卷1〈感皇恩〉，頁82；卷3〈重遇丙子歲有感〉，頁84。

我國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惠，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醜四海。王人之來本國，羈繫拘囚，不啻牢狴，皇勅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可勝言！夫滅天理、糜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量宜居住。⁹

此教完全以華夷正統作為理由，認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使「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其「滅天理、糜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邦」，罪惡至此，理當廢之。依據就是當時朝鮮遵循的程朱正統觀，光海君的行為恰違背了這種被朝鮮視為至理的正統義理。光海君先被流放江華島，再放於濟州島，六十七歲卒於流放地。光海君的悲劇說明儒家正統觀念對朝鮮影響何等深遠，不但思想上將其奉為圭臬，現實中亦不得違背。否則，國王寶座將有不保之危險。這樣的教訓令以後的國君時刻警醒，以免重蹈光海君覆轍，故始終將尊攘的大旗高高舉起，尊明反清，以確保政權穩定。

仁祖晚年，發生沈器遠叛亂，亦是對仁祖成為清朝藩屬不滿所致。仁祖二十二年(1644)，青原府院君沈器遠等認為當時「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故欲發動政變，「內清朝廷，外攘夷虜」，「拒斥清人，日月重光」，「主上違豫已久，必擇先王子及宗室中有令名者，勸上傳位，而尊上為上王。事成即用崇禎年號，書示八方」。¹⁰ 叛亂動機與目標十分明確，就是對仁祖臣服清朝極其不滿，要推翻仁祖王位，另立他王，以行尊明反清之道。可見對正統問題，一旦處理不當，就有可能引發危機，以致政權動盪。而尊周思明正是解決這一矛盾的良策。拒斥清朝正統性，宣示承繼了明朝以來的中華正統，從而強化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這是朝鮮「尊王心法，列聖相傳」的內在和現實政治相結合的原因。

大報壇的祭祀，既是一種報恩的行為，同時又是一種正統觀的表示。這種正統觀的表示還有其他層面的含義，即朝鮮正統既是來自於明朝，而在明朝滅亡後，又是對明朝正統的承繼。肅宗之前，雖然清入主中原，但南明勢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南明未滅亡前，朝鮮當然並不覺得應承繼明朝的正統，因此那時朝鮮並未形成所謂「大明一脈，偏寄於東」的自我責任感。當清朝將南明政權消滅，朝鮮就萌生一種承繼大明正統的責任感；而建大報壇，直接祭祀明朝皇帝，正是這種承接正統觀的表示。《小華外史》稱：「興廢繫乎天時，義理根乎人心，故天時或與人違，而義理

⁹ 《李朝仁祖實錄》卷1，仁祖即位年3月甲辰，頁3。

¹⁰ 同上注，卷45，仁祖22年3月己酉，頁430。

無時可熄。今此中國之淪為夷狄，天時之舛也。尊周而攘夷，內華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曆壬寅，皇統雖絕，其後四年已有我東建廟之議。」¹¹ 永曆絕後四年，朝鮮即有建壇崇明之議，以存明統。言下之意，即是因為明朝正統的傳承，永曆絕後，明統無存。一種使命感、一種責任感，迫使肅宗萌生建壇以存明朝正統的思想，從而建造大報壇。

其三，朝鮮反清復明無望，只得放棄冒險的軍事對抗行動。同時，清朝控制鬆弛，使朝鮮修築祭壇成為可能。明朝滅亡後，朝鮮長期以來，以「反清復明」為己任，北伐思想甚囂塵上。孝宗在位十年(1649-1659)，孜孜以求的就是北伐。「掃清胡虜，恢復明室」，為孝宗畢生的志向。但這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孝宗初期，稍露不臣端倪，清朝即派使臣前往查問，孝宗只得斥退那批反清人士。長期醞釀於孝宗心頭的「北伐大計」，最終不過表露於孝宗晚年與宋時烈的一席談話上，而無法付諸行動。但北伐思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為朝臣所倡導，而隨著清朝江山日益穩固，雖然朝鮮一廂情願地希望明朝光復，但終究只是一場空夢。有鑑於孝宗反清之不果，顯宗(1659-1674在位)似乎就甘於命運，再無那些類似反清的舉動。肅宗年間，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亂」，人心穩定，國力昌盛。朝鮮亦看到清朝「即今南方人多為達官」，遺民子孫亦皆為大清官吏，楊漣和孫承宗的子孫都為清朝官吏，「天下之忘大明久矣！」¹² 認為即便明太祖再世，亦不可能恢復大明江山。面對著清朝這種景象，朝鮮一方面放棄以前恢復明朝江山的夢想，而同時思明反應更為強烈。

肅宗儘管覺得恢復明朝已不可能，但內心仍在祈求明朝興復。肅宗四十年(1714)正月初一春節，肅宗賜海昌尉吳泰周詩曰：「新年何以祝，燕氛願廓清；泰運從今啟，皇朝業復明。」¹³ 他依然心存大明恢復之心。由此一方面他要謹慎地應對清朝，另一方面又要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對明、對清的矛盾心態下，於是就致力於祭祀禮節上，以達到其內在心態上的平衡。

肅宗之前的國王未敢建大報壇，與清朝所採取的政策有關。清朝對朝鮮一直是採取施恩與約束二者併用的手法。入關前，拘人質，以監視督責為主。因為當時明朝尚存，為了迫使朝鮮履行藩邦之責，清朝只得採取強迫的手段。入關後，清朝對朝鮮的政策有很大的改變，主要以施恩籠絡為主，同時也時刻警惕朝鮮的舉動。明朝雖亡，南明又殘存了十六年，不久「三藩之亂」再持續八年，而臺灣鄭氏政權一直延續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敵對勢力始終存在，清人在施恩朝鮮之時，對朝鮮的舉動也就倍加防範。顯宗時期，曾有人提議為神宗建廟，即以時機不當而被否決。但

¹¹ 吳慶元：《小華外史》(東京：朝鮮研究會印行，1914年)，卷7，下冊，頁200。

¹² 宋時烈：《宋子大全拾遺》，《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第116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3年)，卷7〈幄對說話〉；《李朝肅宗實錄》卷14上，肅宗9年4月辛丑，頁437。

¹³ 《李朝肅宗實錄》卷55，肅宗40年正月朔癸卯，頁347。

「三藩之亂」期間，清朝內外騷動，朝鮮雖亦有人主張乘此機會舉事，殺向遼東，顯宗未加採納，從而安守藩國之位。因此「三藩之亂」後，朝鮮獲得康熙信任，以後清朝即以施恩為主，而不加提防了。這樣也就營造了一個適當寬鬆的環境，使朝鮮能較為正式地從事祭祀明朝的活動。

其四，企圖以大報壇振肅世風，扭轉頹廢，乃肅宗建壇的又一重要原因。肅宗是朝鮮倡導和堅持尊周思明政策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朝鮮建造大報壇的關鍵人物。他即位以後，即大肆提倡尊周思明，經常與朝臣談論明朝再造之恩。《尊周匯編》評之曰：「王常以武略不競為憂，命群臣議定防胡陣法。筵臣講朱子書至『義理無限，歲月如流』之語，深陳國恥未雪，聖謨未展，王為之愴然摧咽。嘗曰：『春秋大義，是予家法。』其至誠惻怛，永有辭於後世。」肅宗三十年(1704)，明朝滅亡週甲之際，肅宗同朝臣談及亡明之事。「今年即甲申也，大明以是歲三月亡」。對於崇禎如此「英明」的皇帝竟淪為亡國之君，「有嗚咽不忍讀者矣」。崇禎上吊於煤山，以身殉社稷，朝鮮始終認為乃千古罕見之大義。正如前面已經談到，肅宗極其強調明朝的大恩大德，雖然大明於朝鮮有大恩，但是朝鮮人則事久而忘，肅宗顯得相當不滿：「到今年紀愈久，世道愈下，復讎雪恥，固非朝夕所可期，而至於疏章間，慷慨之言，亦未有聞，已至於寢遠寢忘之域，予常慨然。今逢週甲，一倍感愴矣。」肅宗對當時朝鮮「寢遠寢忘」之域非常痛心，領議政申晚亦有同感，認為「今日則人心恬嬉，非但世無慷慨之人，並與大義都忘之矣」。肅宗對清使前來，而朝鮮人夾道觀光，「視同華使，其無含冤忍痛底意可知」，直稱「世道至此，良可寒心！」於是肅宗就尋求一條「使之不忘之道」。¹⁴

肅宗對於世風日益踈淡，淡忘明朝再造之恩，倍感愴然。這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情景。肅宗在建日新軒時所講的「天下之事，不日新則日退」，故而思明感恩、尊周之事，亦當「日新」。肅宗十九年(1693)，在觀武堂旁建日新軒，肅宗親製《日新軒記》，曰：

大抵天下之事，不日新則必日退。而況人主一心出治之本、萬化之源，苟不日新其德而振作之，則何以建中於民哉。……今夫學有所未盡，則思所以日新之；德有所未修，則思所以日新之；聽言之道不恢，則思所以日新之；作人之方不古，則思所以日新之；懷保之澤未孚，則思所以日新之；自強之策未至，則思所以日新之。隨事省察，終始惟一。而若其日新之本，必自割斷一箇私字，而始果能。¹⁵

¹⁴ 《尊周匯編》，卷6，頁483-84；《李朝肅宗實錄》卷39，肅宗30年正月庚戌，頁540。

¹⁵ 《李朝肅宗實錄》卷25，肅宗19年5月丙辰，頁44。

凡事皆要「日新」之，肅宗對明朝有滿腔的追憶感恩之情，經常提及壬辰再造恩情，為萬世不可忘，其意在「日新之」。因為當時朝鮮人對明朝之恩，「寢遠寢忘」，肅宗頗為憂心，因而想建大報壇，以喚起感恩思明之情感，進而將那種思明的情感禮儀化、制度化，真正使之能「日新日日新」。

對於南明政權迅速滅亡，肅宗以為與神宗再造藩邦、消耗了國力有關，因而肅宗對亡明還有種負罪感，更促使肅宗建壇。肅宗將南明與南宋進行比較，認為宋高宗雖然不能收復祖宗舊境，但還可以偏安江左，保有江山百餘年。而南明弘光以後，分崩離析，一片江左亦不能保全。肅宗認為「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於東征」。在肅宗看來，明朝壬辰戰後不久即亡，而南明亦土崩瓦解，不能長存，與壬辰戰爭之際，明出大兵拯救朝鮮而傷損國力有關。朝鮮既不能「復讎雪恥」，又未能與南明相通，因而「未嘗不慨恨」，¹⁶ 內心隱藏著深深的愧疚之情。在其講求日新其德、日講其恩，外加這種內疚之情，諸多因素促使肅宗要建造大報壇，以崇祀明朝皇帝。

在肅宗看來，楊鏞、邢玠以東征帥臣皆有祠宇，而作為皇帝的神宗卻尚無廟祀，認為朝鮮之得有今日，莫非神皇之力，「而深仁厚澤，無地酬報，予心感慨，尤切於是年矣」。¹⁷ 既然東征將帥皆有祠廟，為何神宗皇帝卻無廟祭奠呢？故而肅宗認為當給神宗建廟，以加崇祀。

綜上所述，朝鮮建廟崇祀神宗有幾方面的原因：壬辰明軍東征之恩，萬世不可忘，建廟以示感恩；而當時「寢遠寢忘」，世風日下，建廟以振肅世風，喚起人心；南明速亡，與明朝東征時，國力耗損不無關係，因而在明朝滅亡後，朝鮮更有責任崇祀明朝皇帝；同時作為東征將帥皆有祠廟，而作為皇帝倒無廟祀，不合情理；而以建壇崇祀，強化與明朝的關係，從而宣示朝鮮承繼了明朝之後的中華正統，以確立其政權的正統性，解決現實中的危機與矛盾。可見，諸多因素促使肅宗決定興建廟宇，以祀神宗皇帝，表達其思明感恩之情，使尊周思明能日新月異，明朝恩德萬世銘記。

大報壇創設之經過

明朝滅亡為甲申年(1644)，肅宗三十年(1704)又為甲申年，六十年一個輪迴。正月初一，新春來臨，肅宗觸景生情，對朝臣談及明朝壬辰再造之恩，隨即向朝臣提出當給神宗皇帝建廟。沒想到，此言一出，竟受到了空前的阻力。從肅宗三十年正月初一首次討論，到大報壇最後建成，歷經三次大的討論，歷時九月有餘，方才最後定奪。從這幾場討論中，可以看出一般朝臣對崇祀明朝皇帝的心態與肅宗國王不同，並進而透視當時整個朝鮮士大夫的思明心態。

¹⁶ 同上注，卷18，肅宗13年2月辛亥，頁598。

¹⁷ 同上注，卷39，肅宗30年正月庚戌，頁540。

其實，崇祀明朝皇帝，並非發端於肅宗。南漢兵敗，仁祖臣服於清朝，1638年正月初一日，仁祖於宮中為明朝設祭，面向中原，痛哭流涕，次年再舉行一次，開啟祭祀明朝之先例。肅宗建壇崇祀神宗皇帝，可說是受其啟發。他多次提及仁宗被圍南漢山城，內外交困之際，尚知崇祀；而他自己統治之時，天下太平，倒無崇祀，不合情理，更促使肅宗決心建壇。

在肅宗三十年之前，朝臣至少有四次奏請為神宗皇帝建廟。早在顯宗八年(1667)五月，湖西進士李重明上疏，首倡建廟之議。隨後顯宗十三年(1672)閏七月祥原儒生周東伯、肅宗十三年(1687)五月高城進士慎懋、肅宗二十五年(1699)前僉使朴崑皆上疏請求為神宗建廟。而在肅宗與朝臣討論之際，宋時烈門人權尚夏秉承師命，已建萬東廟於清州之華陽洞，開始崇祀明神宗、崇禎帝的活動。可見為神宗皇帝立廟，在當時是存在於朝鮮士人心目中的一種相當普遍的觀念，大家自覺應以立廟的方式來祭奠神宗皇帝，以報答他壬辰拯救之恩。而此次提議為神宗建廟的是肅宗國王本人，大臣竟然反對甚烈。大臣之所以反對，並非認為崇祀神宗不當，而是覺得建廟崇祀神宗牽扯太多，怕惹麻煩。綜合言之，反對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是禮節上的問題，以藩國之君祭中國皇帝，古無此禮，不知如何處置。藩國祀天子於禮難處，藩國祀天子為僭，這是諸大臣議論最多的一點。「但念廟而享之，於禮為僭，況儀文之窒礙」。若建廟祀明神宗，那與朝鮮宗廟的關係又如何，亦是應當考慮的問題。認為朝鮮立神宗廟，「則事體當加隆於宗廟，如處所時享樂章等儀文，節節難便」。¹⁸祭神宗之廟自然要比宗廟更為隆重，對宗廟有所礙逼。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依從儒家理念治國的朝鮮，十分重視禮儀制度，不得有半點錯謬，故而成為朝臣反對的重要理由。其次，事機不密，恐洩漏於清，徒增麻煩。「人心世道，日益危惡，我國機事，像胥輩無不漏泄，萬一有詰問之舉，則實為目前之急矣」。擔心清朝責問，是群臣反對又一原因。最早顯宗時，有人提議為神宗建廟，即以此原因而被否決。因為以清朝藩國卻祭祀前朝皇帝，於禮節上無疑有僭越之嫌，是對清朝不臣的表示。而當時清朝對朝鮮還並非完全信任，雖然開始施恩，但對朝鮮的舉動甚為敏感，一旦發覺朝鮮有反清舉動，清朝勢必再會施壓。而同時，朝鮮國力匱乏，民力殆盡，難有興作之役。「方今國儲匱竭，民力殆盡，興作之役，豈不難哉！」因此，朝臣提出國王欲報明朝拯救之恩，不必諸求末節，「殿下欲報天地之大德，則恐無逾於勵志薪膽，刷恥雪冤」。¹⁹提議國王應臥薪嘗膽，勤於治國，以求洗刷恥辱，方為感恩正道。

可見，主要是兩方面的問題：禮節上的難處與清朝的知悉。首次討論中，朝臣之中唯獨戶曹參判權尚夏支持肅宗。討論時，權尚夏似乎並不在朝中，左議政李奮特

¹⁸ 同上注，頁541。

¹⁹ 同上注。

以私書問之。權尚夏在回書中，對反對意見一一加以批駁，認為肅宗提議建廟，表明肅宗「睿志卓然高出百王」，因為建廟「可以激三韓忠義之士」，如果諸臣反對，使之不成，「則我聖上尊周之義，無以著明於天下後世，而群下亦不得辭其責」。因此不能顧忌一時嫌礙而有所持難，他針對朝臣提出的意見，逐條批駁：其一，藩國祀天子是否僭猥：他說春秋時期杞宋以諸侯祀夏殷，未聞有僭猥之譏，古有此禮，故不能說朝鮮祀神宗為「僭猥」。且認為君臣、父子其義相同，「今既無子孫之祀，則以舊臣而祀舊君，亦何所不可哉！」其二，禮貌是否加尊於宗廟：權尚夏提議神宗之祀可置於上旬，宗廟之祀退於中旬，「固不害為尊屈之道」。而至於侑舞、樂章，重新撰定，由有關衙門專門處理，當可解決，並非難事。其三，清人之責難：以為明朝對朝鮮有恩，天下所共知，如今朝鮮追念舊事，略舉崇祀之典，出乎天理，合乎人情，「何必為之呵禁哉！」清人亦以明亡於流賊，其入關乃為大明報讎，並上崇禎諡號。若清人呵責，可以此為對。所謂國力匱乏，民不堪興作之役，皆為托辭，不足為辯。同時，他提議，若以都城非便，可擇舊都江都，既僻靜，建廟必無「礙逼之勢」。²⁰

大臣中雖只有權尚夏一人支持，成均館儒生則支持者甚眾。此次討論數日後，儒生鄭享益等一百六十餘人聯名上疏贊成為神宗皇帝建廟。²¹ 第一次辯論，雖然反對者多，讚成者少，但朝臣皆知肅宗心意。肅宗亦於是次討論時，知道權尚夏已建祠於華陽洞，崇祀明神宗、明崇禎帝。²² 在權尚夏支援下，肅宗更堅定了建廟的決心。

兩個多月後的三月丙午，再次討論此事，反對意見竟大為減少。朝議一開始，肅宗即說：神皇建廟事已告諭諸臣，「此是早晚必行之盛典」。首先肅宗就表明建廟決心，令反對者不敢再有異議。既然肅宗之意已決，朝臣也只能附和。後來朝臣商議，建廟於禮制難行，設壇則可省麻煩，於是就改廟制為壇制。左議政李奮引中國漢朝丞相韋玄成之言：父不祭於支庶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對神宗不能立廟，只能建壇，從而將廟制改為壇制。²³ 這樣既實現了崇祀明神宗的目的，又避免了禮節上的難題。²⁴ 同時以昌德宮宮中後苑為「不煩耳目」之地，決定建壇於此處。此事遂定下來，肅宗頓感欣慰。《備忘記》引肅宗言曰：「今日建廟，不特予崇報之誠，實在

²⁰ 同上注，頁541-42。

²¹ 肅宗在答書中稱：「省覽多士的封章，不覺感涕之沾衣了，爾等今日之請即予之至願，可不留心焉。」見《李朝肅宗實錄》卷39，肅宗30年正月壬戌，頁542-43。

²² 關於華陽洞的崇祀情況，參見孫衛國：〈試論朝鮮儒林之尊周思明——以華陽洞萬東廟為中心〉，載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九輯（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37-57。

²³ 《李朝肅宗實錄》卷39，肅宗30年3月丙午，頁549。

²⁴ 對於這一點，馮爾康有詳盡的分析，參見其文〈朝鮮大報壇述論〉，頁124。

於此，神皇在天之靈，亦安知不戀茲東土耶？尊周之義，皎如日星，予志之定，堅如金石，斷不可已也。」²⁵ 建廟決心十分堅定，既予「崇報之誠」，又表「尊周之義」。因此在肅宗看來，建廟崇祀神宗是重要的尊周舉動。崇祀神宗即是尊明，尊明也就是朝鮮尊周。

第三次討論則是在大報壇議定之後，肅宗覺得建壇還不足以表達其感恩之情，「上既於今三月設壇後苑，親祭毅宗皇帝，必欲為神皇立廟以致隆」。肅宗心目中以為廟比壇更為重要，更為隆重。所以在立壇議定六個月後，他還是提出要為神宗立廟。此次已沒有大臣附和了，幾乎是一致反對，因為諸臣皆以為既立壇，就毋需再建廟。正如左議政李畬所論：「立廟一款，終恐難行。抑有一道：天之於天子，天子之於諸侯，其尊相等。若以天子祭天之禮祭天子，則稍有可做，而設壇掃地，而行事實祭天之禮，至敬無文之意也。」李畬的意見很具代表性，以為壇制乃比擬天子祭天之禮，作為藩國的朝鮮無祭天之禮，宗主國明朝方有祭天之禮。因為明朝與朝鮮就如上天與明朝的關係，只能用祭天之禮祭神宗，立廟反而亂了禮節。藩國國王不能直接祭祀宗主國皇帝，但朝鮮依明朝祭天之禮，祭祀明朝皇帝，則避免了禮節上的矛盾，因為在朝鮮看來，天之如明朝，即如明朝之於朝鮮，可類比，故而可以立壇。肅宗見諸臣皆以設壇為是，雖不甚如意，但覺得「亦可以少伸至誠」，後來肅宗亦認識到：「不廟而壇，出於周思，則雖用壇制，實同立廟。」²⁶ 於是方最終打消建廟的念頭。

肅宗三十年(1704)十月初三日，大報壇破土動工。歷時二月餘，十二月即建成。於是肅宗三十一年(1705)三月癸卯，肅宗在大報壇首次親祭神宗皇帝，設黃帳房，奉安神宗神位，用紙榜，入六佾舞，奏樂。王世子率百官陪祭。祭畢回至宮中，肅宗即出御筆於承政院曰：「今曉祇詣皇壇，已舉殷禮，幾年經營，竟遂至願。」一樁心事終於得以了結，肅宗內心不盡欣悅。他意猶未盡，當即揮毫作詩道：「大報壇成肇祀親，時惟蠶月屬和春；衣冠濟濟班行造，磬筦將將醴幣陳。昔被隆恩銘在肺，今瞻神座涕沾巾；追思豈但微誠寓，切願寧陵聖志遵。」又作詩曰：「莫須建廟更持疑，德海恩山忍忘之；況是重丁皇祚絕，永懷一倍黍離悲。朝宗大義伸無處，崇報微誠即在茲；豈但平生吾願遂，寧陵志事庶期追。」寧陵即孝宗，其詩表明其祭祀後之興奮狀態，而且表達這種追思明朝恩德的行為，並非只是肅宗本人之「微誠」，而是遵循了孝宗以來歷代國王的志願。從此開啟了朝鮮大報壇崇祀之例。對於肅宗之詩，諸臣皆以為，「一字一句皆從尊周血誠中流出，有以見大聖人所作出尋常萬萬，凡在瞻聆，孰不聳動！臣等一唱三嘆，感涕自零，不知所以為喻也」。肅宗命諸

²⁵ 《李朝肅宗實錄》卷39，肅宗30年4月乙卯，頁553。

²⁶ 同上注，卷40，肅宗30年9月癸丑，頁584，585；同卷，肅宗30年12月丙戌，頁600。

臣和進。在肅宗看來，這是何等快慰之事，因為此後，「年年祭享，自當與國同存矣」。²⁷ 肅宗願望最終成為現實，而他所希望的大報壇「與國同存」，後來也成為事實。幾百年間，大報壇香火一直不斷，直到1908年，迫於日本的壓力，大報壇被遭撤享。可見，儘管面臨諸多的困難，肅宗終能立壇以祀神宗皇帝，了卻多年的心願。大報壇此後就成為朝鮮尊周的聖地，意義相當重大。

首先，朝鮮有一個真正表達思明感恩的場所。肅宗之所以念念不忘要建廟崇祀神宗，總覺得其處太平天下，尚不如仁祖南漢山城之時。壬辰再造之恩，使朝鮮背負著一種責任，對於朝鮮王朝來說，明朝之「恩是債務，必須償還。……『報恩』則是積極的，緊張如弦，刻不容緩的償還」。²⁸ 既然明朝已經滅亡，無法實施其償還的目的，於是就只得以崇祀神宗皇帝的方式，來表達其償還的心態，尋求內心的安慰。其次，雖然思想上，明朝對朝鮮有永世不忘之恩，清朝則有刻骨的讎恨，但現實中，朝鮮卻不得不向清朝執事大之禮，扮演藩國角色，力盡藩國義務。這種現實與內在心態的矛盾迫使朝鮮要尋求調和的方式，大報壇正可扮演這樣的角色。為減少其內心的疚愧，每當祭祀之際，朝鮮總覺得是向明朝表示感恩，可以弭平現實中的愧疚與內心的不平。多次當朝鮮國王接見了清朝使節後，即便按照慣例須行大報壇祭祀禮節，國王總會先暫時放下，尋找合適的時機，而不會馬上就行祀明祭禮。其三，大報壇不只是一個崇祀的場所，更是朝鮮保存中華正統的標志。南明滅亡後，朝鮮看來，中華正統已絕，作為「夷狄」的清朝並未承接這種正統。而原為明朝藩邦的朝鮮，歷來有「小中華」之稱，朝鮮王朝更以「小中華」為榮，因而通過大報壇的設立崇祀明神宗，從而宣示其承接了中國自古以來而絕於明末的中華正統。因此，自肅宗開始歷代朝鮮國王對大報壇祭祀都相當重視，英祖更加以發揚光大，由神宗而太祖、崇禎，強化朝鮮與明朝的關係，確保其中華正統的象徵。

大報壇的構造與崇祀禮節

朝鮮以明朝天子祭天之禮來祭明神宗，故建壇而不立廟。壇制倣社稷之制，從壇號到壇制，都有仔細的考慮。下面略述其壇制構造及相關的崇祀禮節，從中更可以體味出朝鮮建造大報壇的意義及其象徵涵義。

²⁷ 同上注，卷41，肅宗31年3月癸卯，頁621；《大義編》前集卷2，頁86；《李朝肅宗實錄》卷41，肅宗31年3月癸卯，頁621；同卷，肅宗31年3月乙巳，頁622。

²⁸ 魯思·本尼迪克特(著)、呂萬和等(譯)《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80。本尼迪克特雖然是論述日本人對「恩」的想法，在此用於分析朝鮮對明朝的心態亦是相當貼切的。

壇號與壇制

肅宗與朝臣議定建壇後，即以二品以上官員議定壇號，「以重其事」。閔鎮厚以為泰壇即圜丘之號，以「泰」字定號，以倣效天之義為當。大提學宋相琦則以「大報」二字上奏。「大報」之義，具載於《小戴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致上帝也。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意思是諸神之祭，以日為主，祭天之時，以祖宗配享，示以不忘本根。取其語為壇號者，「以郊祀之禮而寓崇祀之意」。壇號即點明其建壇目的，崇祀以報恩。肅宗當即批准採用，「定入二字，允叶義理，無容更議也」。²⁹

壇建在昌德宮禁苑之西，乃朝鮮國王宮中後苑，既避人耳目，又便於國王祭祀。壇制採左議政李畬言，「倣我國社稷之制」，具體而言：有壇有牆，牆高四尺，比社壇加高一尺，方廣二十五尺，四面皆為九級，壇、牆四面皆三十七尺，自壇所築外牆，以防行人俯視。可見，雖然倣社稷之制，但比社稷壇加高一尺，更高更大。而祭物品式，遵用明朝之制。祭器依《大明集禮》圖式。神座、黃帳房，皆依《明會典》圖說。六佾樂器，則以南北郊祀所用推移用之。行祭儀文，一併依明朝之制。³⁰

祭禮時間與規格

朝鮮王朝的祭祀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分。大祀有宗廟、社稷等祭祀，宗廟祭祀一年凡五次，各孟月上旬以及臘月皆行祭。社稷之祭一年凡三次，春、秋仲月上戊及臘祀行祭。中祀凡風、雷、雨、嶽、海、瀆、先農、先蠶、文廟王孔子、歷代始祖，或一年兩祭，或一年三祭。³¹ 而大報壇則被列為大祀，在朝鮮王朝中是最為突出、地位最高的祭祀。

肅宗三十年(1704)十二月丁亥，大報壇建成，乃定一年一祀。但在此之前已有宣武祠、武烈祠之祭祀，享為春、秋兩祭。諸臣皆以為大報壇一年一祭為宜，但何時合適，則稍有爭論，終以三月為定。肅宗以為「大報壇祀事在季春，而宣武祠春祭，先行於仲春為未安，命自今退行於壇祀之後」。肅宗認為大報壇在武烈祠後不妥，應將武烈祠祭祀時間後撤。當時大臣又反對肅宗之提議，主要認為禮節上講，大報壇祭祀同於天子祭天，乃是朝鮮至尊無上的祭祀，不可同其他的祭祀相提並論。判府事李畬指出：「大報壇之設，不以廟而壇，歲一獻亨者，蓋倣郊天之義。其禮至尊至嚴，不可與常祀以時節行事者比論也。古今祀典，如風、雲、雷、雨、嶽、瀆、

²⁹ 《小戴記·郊特牲》，見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52-53；《尊周匯編》卷8《皇壇志》，下冊，頁3；《李朝肅宗實錄》卷40，肅宗30年9月辛酉，頁586。

³⁰ 《李朝肅宗實錄》卷40，肅宗30年12月丁亥，頁600；同卷，肅宗30年10月辛巳，頁590。

³¹ 《經國大典》，《學東叢書》第六種(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1年)，卷3《禮典祭祀》，頁273-74。

孫衛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山、川，皆祭以春秋，而至於圜丘、方丘之禮，歲只一祭，踈數不同，豈非以敬愈至而禮愈簡故也？」李頤命亦認為不可與他祠較量祭祀踈數先後，又與祀前代帝王而與享其臣者自別，「況論以大一統之義，則自我宗社百祀，並壓其尊，何獨於宣武之祠，特殺其禮乎？」由此顯示當時的大臣皆認為大報壇祭祀是至尊無上的，祭祀時間與次數都無需比擬其他祭祀。正因為大報壇祭祀是至尊無上的，故不應以祭祀次數多少來判定其尊卑。一年一祭，正表明其至尊無上，不可與常祀相比。因此認為將大報壇與宣武祠等比附並不合理，也不能因為大報壇為一年一祭，而減少宣武祠一年兩祭的傳統。因為「楊、邢二公，自其生時繪像，而俎豆於春、秋，國人甘棠之恩已百年矣，今不宜遽變其享式」。³² 故而，最終宣武祠祭祀一仍其舊，一年春、秋二祭，不因大報壇而有變化。

大報壇祭祀既然以祀天之禮來祭神宗，一開始就確定其為至尊無上的祭禮。大報壇祭祀亦高於朝鮮宗廟祭祀，是朝鮮任何山川神仙祭祀都無法比擬的。這種祭祀此後二百年內，一直成為朝鮮王朝最為重要的祭典，也是最為隆重的祭禮。這顯示肅宗是以無比敬畏的心態去祭祀明神宗，表明其對明朝感恩思報之至誠。英祖更得以擴展，由神宗而推及太祖、毅宗，由一帝而三帝。大報壇終究成為朝鮮尊周思明最為集中的體現。

英祖感皇恩與大報壇的變化

英祖1725年繼位，1776年崩，在位五十二年，是朝鮮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國王。³³ 1776年崩後，上廟號為英宗，1889年改為英祖，是朝鮮王朝第二十一位國王。他繼位之後，繼續推行仁祖、孝宗、肅宗以來的尊周恩明政策，大力提倡尊周。英祖在位期間，清朝為雍正、乾隆時期。在清朝看來，當時的朝鮮已是一個極其恭順的藩國，謹守藩邦職責。但英祖在國內卻大力推行思明政策，宣揚明朝恩德。他不僅組織官員編修了許多明史書籍，而且繼承和弘揚了大報壇的崇祀活動。他將肅宗以來大報壇只崇祀神宗一人，進而推及明太祖、明崇禎帝，使大報壇由獨祀神宗而擴展為三皇並祀。英祖大講尊周之策，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的重要人物；在位五十二年期間，又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的重要時期。

³² 《李朝肅宗實錄》卷53，肅宗39年2月戊辰，頁305；同卷，肅宗39年3月癸未，頁306-7。

³³ 英祖廟號原為英宗，後尊為英祖，為求統一，本文一律用英祖相稱。參看JaHyun Kim Haboush, *A Heritage of Kings: One Man's Monarchy in the Confucian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該書乃研究英祖的專著，對於英祖治國理念、儒家正統對他的影響，以及晚年處死思悼世子的悲劇都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英祖的思明情感

英祖在位期間，苦心扶植反清崇明的理念。在處理理念與現實的矛盾時，英祖表現了高超的技巧。現實中，他與清朝保持藩屬關係，表現相當恭謹；但同時理念中又把清朝看成夷狄，極其推崇尊周思明之策。他以《國朝寶鑑》未能首列肅宗尊周大事，深感「痛心」，而特編《國朝寶鑑別編》，論道：「嗚呼，我聖考體孝廟之大義，尊周盛德，爛明於青丘，誠可以互萬古不泯矣。」³⁴從而開啟了編修《國朝寶鑑別編》之先例，正祖以後又補修仁祖以來歷朝《別編》，其目的就是敘述朝鮮王朝尊周思明之事。而他自己每每對朝臣大談明朝恩典。英祖親製《皇壇儀序》，論道：吾皇壬辰再造之恩，可謂沒世不忘者，而我聖考建壇追報，垂大義於萬世。「此壇可以與青邱而不泯」。³⁵極其稱頌肅宗建造大報壇之功。而他一生中寫過多首〈感皇恩〉詩，或名〈憶皇恩〉，或曰〈頌皇恩〉，或名〈感皇恩〉，其中心內容是感明之恩，其中一首〈御製憶皇恩〉詩，轉錄如次：

憶皇恩，憶皇恩，受命朝鮮是皇恩；憶皇恩，憶皇恩，九章八音是皇恩；憶皇恩，憶皇恩，特定宗系是皇恩；憶皇恩，憶皇恩，再造藩邦是皇恩；憶皇恩，憶皇恩，命將東援是皇恩；憶皇恩，憶皇恩，慰諭頒曆是皇恩；憶皇恩，憶皇恩，粵昔國初受皇恩；憶皇恩，憶皇恩，海東草木受皇恩；憶皇恩，憶皇恩，光國志慶受皇恩；憶皇恩，憶皇恩，宗社再安受皇恩；憶皇恩，憶皇恩，小邦亦微受皇恩；憶皇恩，憶皇恩，永誦風泉受皇恩；憶皇恩，憶皇恩，瞻彼中州心掩抑；憶皇恩，憶皇恩，何時河清膽慾墜；憶皇恩，憶皇恩，壹隅海東有大明；憶皇恩，憶皇恩，北苑一壇奉三皇；憶皇恩，憶皇恩，躬見肆儀若親行；憶皇恩，憶皇恩，何時報心千億；憶皇恩，憶皇恩，何時謝懷百萬。³⁶

這是英祖四十九年(1773)所寫的一首〈御製憶皇恩〉的詩，詩中他把明朝對朝鮮所施的一點一滴的舉動皆看成是皇恩，從賜號朝鮮，到頒曆賜樂、改定宗系、命將東援、再造藩邦等等，皆當成無法回報的「皇恩」。而詩的後半部分則表明他為了報答明朝之恩，所採取的感恩舉措，表明其感恩思報的志向千年不移。

英祖對明朝的這種心態，決定了他所採取的措施。在英祖看來，明朝對朝鮮所施之恩，真可謂重於泰山，闊如東海，即使世代崇祀，也不太可能報其恩於萬一。正因為英祖極其強烈的感恩心態，所以當他獲知在仁宗被圍南漢山城時，崇禎帝不願

³⁴ 《國朝寶鑑別編》(漢城：驪江出版社，1985年)，卷6〈英宗御制肅宗朝別編凡例〉，頁181。

³⁵ 〈英祖大王御制皇壇儀序〉，載《朝宗慶文獻錄》(漢城：景仁文化社，1980年)，頁12。

³⁶ 英祖〈御製憶皇恩〉云，時當「歲皇朝崇禎戊辰紀元後三癸巳，即昨四十九年春三月壬辰日敬書」。見《大明遺民史》(漢城：保景文化社，1989年)，頁398-40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內外交困的局面，指令山東巡撫出兵救援朝鮮之史實時，當即決定在大報壇一同崇祀崇禎皇帝，並進而因「大造」之恩，擴展到明太祖朱元璋，從而將大報壇的崇祀又推向新的階段。

大報壇由獨祀神宗到三皇並祀

英祖對明朝有滿腔的感激之情，當他獲悉應教黃景源報告《明史》記載崇禎帝曾有意救援朝鮮時，遂決意一併崇祀毅宗，進而推及太祖，最後還設立從享三明臣。但其間亦經過許多的曲折，大報壇設立時，經過了三次大討論，才最後定案，而由獨祀神宗到三皇並祀，亦經過了三次大的討論，其過程甚至較初創設時更為困難。黃景源指出《明史》記載崇禎出兵援救之事，而決定把崇禎與神宗一並祭祀，這過程似乎並不太難；但當英祖提出要一道崇祀太祖時，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英祖由疾言厲色到痛哭流涕，都無濟於事，最後沒法，只得搬出肅宗〈御製隆武堂〉二絕，方才說服諸臣，使此事得到落實。從這一過程中，可以體味英祖思明感恩之堅定與崇祀明朝三帝之決心。

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初一日，應教黃景源報告《明史》記載崇禎十年(1637)，崇禎帝獲悉朝鮮仁宗被皇太極圍困於南漢山城，當即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明史》原文如此敘述：

〔崇禎〕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責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潰。朝鮮告急，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三月，洪範奏官兵出海。越數日，山東巡撫顏繼祖奏屬國失守，江華已破，世子被擒，國王出降，今大治舟艦來攻皮島、鐵山，其鋒甚銳。宜急救沈世魁、陳洪範二鎮臣，以堅守皮島為第一義。帝以繼祖不能協圖匡救，切責之。亡何，皮島並為大清兵所破，朝鮮遂絕。不數載而明亦亡矣。³⁷

《明史·朝鮮傳》雍正年間即先領頒行朝鮮，而乾隆初年，《明史》刊行後再頒行朝鮮。肅宗建大報壇時，《明史》尚未完稿，故而不悉此事。而英祖二十五年(1749，乾隆十四年)應教黃景源遂以此事上告英祖。就是《明史》這數行史料，促使英祖有一大舉動，把大報壇由獨祀神宗變成崇祀明太祖、神宗、崇禎三帝的祭壇。

黃景源上奏英祖時，以為如果南漢山城數月不下，陳洪範部隊必至城下，而且他認為崇禎帝不責備朝鮮不能守城，反而責備陳洪範援救不力，以為「出師之恩，毅宗、神宗何間。……其憫念屬國之恩，未有如我毅宗者也」。³⁸於是他提出「皇壇不

³⁷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320〈朝鮮列傳〉，頁8306-7。

³⁸ 《李朝英祖實錄》卷69，英祖25年3月己酉，頁5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祀毅宗，臣竊傷之」。英祖馬上表示同意，並說如果肅宗建壇之時，看到《明史》記載，必將崇禎帝一併崇祀的。

三月初二日，也就是第二天，英祖正式與朝臣商討，期望朝臣讚同大報壇一同崇祀崇禎帝。與肅宗第一次討論設立大報壇情況一樣，諸臣議論紛紛，反對意見居多，以為大報壇原只為神宗皇帝而設，朝鮮世受明朝之恩，「今皇朝淪亡，雖自高皇帝祀之，豈曰盡伸情禮！」但神宗「竭天下之力再造垂亡之國，此實載籍以來所未有之恩，蓋祇為神皇設壇而不並祀毅皇也」，這是設立大報壇的初衷。而崇禎之救援與萬曆再造之恩有輕重厚薄的不同，因而不宜拿崇禎帝比附神宗皇帝。金若魯曰：「事固有異，神宗動天下之兵，再造東國，毅宗出師旋撤，德意不無輕重。」顯然認為崇禎帝出兵，不能同神宗皇帝出兵拯救相提並論，這成為諸臣反對的重要理由。面對朝臣這樣的反對意見，英祖不以為然，批評道：「臣與子以受恩厚薄事君父，焉用臣子哉！試思崇禎時景象，清兵滿遼陽，流賊遍中原，然猶欲涉海出師，遠救屬國。中夜念此，不覺淚下。毅宗德意，無異神皇。」英祖堅持要崇祀崇禎帝，第一次討論就這樣擱下來了，朝臣也無法接受英祖的意見。十餘日後，三月壬戌，再次討論崇祀崇禎帝之事，如同肅宗第二次的情況一樣，經過十餘日的醞釀，反對意見竟消聲匿跡。朝臣一致同意大報壇同祀神宗、毅宗，進善尹鳳九進而曰：「毅皇國亡君死之正，載籍所未有，推此一節，足以血食於無窮。」對於朝臣皆能理解並支持崇祀崇禎帝，英祖非常欣慰地說：「僉議詢同，嗚呼！報我毅宗，其將有日。瞻仰皇壇，涕泣沾襟。」當即指令改造大報壇，設立崇禎帝的祭祀神位。

崇祀毅宗的事情很順利，但數日後英祖思來想去，認為只祀神宗、毅宗，還不足以完全表達其崇報之意。十天後(辛未)，英祖再召朝臣議論崇祀之事。一開始，英祖就表明心意：「予於無寐之夜，靜以思之，皇壇之祇享二皇不無怵惕之心，神皇陟降，將謂斯何！中州腥膻，而青邱獨存，此正志士痛泣處也。三皇一壇，事體恰當。卿等之意如何？高皇以『朝鮮』二字錫我國號，其恩其義，豈忍忘耶？」³⁹提出不但要崇祀神宗、崇禎二帝，還要崇祀明太祖，因為太祖有賜國號的大造之恩。朝臣獲知要一併祭祀太祖，竟一致強烈反對。理由有二：其一，大報壇崇祀神宗，是報「壬辰之恩」；崇祀毅宗，是「報丙子之事」。但太祖並無此類出兵拯救朝鮮之恩，故「並祀高皇則於禮終有所重難」，於「大報」之本義不符。且並祭太祖，於禮儀上近於瀆，三帝時間上相差太大，禮節上亦不知如何處置。其二，大報壇最初祭祀明神宗，後以《明史》出，再推及毅宗，皆因其有出兵拯救之舉，故「比附而祀」。現再以「大造」之恩推及明太祖，破壞了以前的意圖，且由此毫無原則的推及，「恐無限節」，懼將明朝皇帝全部推及，故同祀太祖不宜輕議。

³⁹ 同上注，英祖25年3月乙巳，頁57；同卷，英祖25年3月壬戌，頁58；同卷，英祖25年3月辛未，頁60。

面對朝臣的強烈反對，英祖痛哭流涕，一再說：「高皇有大造之恩，神皇有再造之恩，忘其大本，似為未安。」⁴⁰ 而且認為只祀二皇，還不如不祀。但朝臣並不理會，毫不退讓。自午時議至辛時，討論三個時辰，還未有結論，朝臣始終認為一併崇祀太祖，與建大報壇本意不合，與禮制亦不合。未達成妥協，遂終不散朝。延至深夜，英祖無法說服諸臣，不管是痛哭流涕，還是疾言厲色，都無濟於事，英祖無法，遂命少退。

二更時分，英祖再於集瑞門召集大臣商議，這時，英祖改變策略，他令大臣讀肅宗〈隆武堂〉二絕。其一曰：「高皇錫我朝鮮號，禍慘龍蛇孰再造；侯度恪謹三百年，如天聖德若何報。」其二曰：「忍道孤城月暈年，自茲不得更朝天；痛哉申年已周六，故國無人薦豆籩。」大臣讀完詩後，英祖拱手俯伏流涕許久，方解釋道：

予不忠不孝人也，諸臣亦非矣。先朝御製中「報」字，即大報之義；「籩豆」即享祀之意。御製吾未記憶，使儒臣讀之，然後始識昔年聖意，此予不孝也。高皇帝、神皇帝功德恩義有所較量於筵中，思之凜然，此予不忠也。今日諸臣以並祀高皇於大報壇，謂甚未穩，忘卻三百年皇朝之恩，豈不非乎？予意已定！⁴¹

見到英祖搬出肅宗之詩，並表明其意已定，原持反對意見的朝臣也只得轉變態度。原來反對最烈的金在魯首先表態：「先朝御製既有『報』字之意，在聖上繼述之道，當決意行之。」顯彥亦曰：「聖教四字，臣罪萬死，上意既定，臣復何言！」⁴² 雖然不服，但已無濟於事。經過這麼一場激烈的爭辯，三皇並祀之事方才定奪下來。隨之，英祖覺得只有皇帝而無從祀大臣，「一隅青邱，大明猶存，而寂寥北苑，一年一度之際，有君無臣，心常嗟惜」。認為「皇壇無一臣從焉，皇靈豈不悵然哉！」⁴³ 與諸臣商量後，即以明朝開國功臣中山武寧王徐達、壬辰戰爭時明朝總兵寧遠伯李如松和以身殉明的文貞公范景文從享大報壇。既已定下三皇共祀，大原則得以確立，餘下細節就好辦理了。

諸臣最後妥協，英祖終於完結心願，於是親寫壇圖，下其制，以一壇分三壇。17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大報壇改修完成，英祖首次舉行三位皇帝祭祀。英祖將大報壇由獨祀神宗而變成三皇並祀，意義甚大，將原先崇祀之含義更加發揚，具體有以下兩點：

⁴⁰ 同上注，英祖25年3月辛未，頁60。

⁴¹ 同上注。

⁴² 同上注。

⁴³ 〈皇壇從享儀軌〉，見馮榮燮(編)《朝鮮文獻錄續集》(漢城：保景文化社，1982年)，頁175-76。

其一，如果說肅宗設立大報壇時，重在對壬辰再造之恩的報答，而英祖將其擴大，其崇祀對象由一帝而成三帝，雖然報恩之意仍存，但更重要的在於表明朝鮮與整個明朝的關係，而並非只是局限於感恩。在朝鮮看來，滿清以野蠻人的姿態盤踞中原，擊碎了朝鮮原本所認同的以明朝為化身的中華世界體系的正統觀，同時威脅著朝鮮本身的文化認同，伴隨著對李朝王權權威性的一種焦慮，是對其一貫認同的儒家正統觀的極大打擊，故而，朝鮮總想方設法加強與明朝的聯繫，從而強化其自身的文化與正統性。⁴⁴這也是英祖強調要崇祀明太祖的重要原因，這樣大報壇就不只是三位皇帝的祭壇，而是代表整個明朝，是朝鮮強化正統的重要場所。英祖自言：「孔子曰：罪我者，其《春秋》；知我者，其《春秋》。予以為知予濫予，皆在此舉也。中華祀太祖於歷代帝王廟，陟降之靈，其肯歆饗乎？今日壇祀可續皇明已絕之香火矣。」可見，英祖並祀三皇於大報壇，即有承繼中華歷代帝王廟崇祀之意，而且英祖把三皇並祀之大報壇比同孔子之作《春秋》，對此是何等看重！正祖亦言：「我東以蕞爾鯨域，粗知禮義之方，世有中華之稱，而今則人心漸至狃安，大義轉益湮晦。北走之皮幣，看作常事，不以為恥。思之及此，寧不心寒！漢官威儀，不可復觀；神州腥膻，不可復掃。惟此北苑尺壇，略寓執壤之誠。大明日月，只照一區之邦，庶可以有辭於後世。」把大報壇作為儒家禮義之象徵、大義之寄託。企圖以大報壇祭祀喚起人們對明朝的思念，對華夷大義之執著，大報壇成為朝鮮確保和弘揚中華正統的象徵。純宗亦言：「吾邦之有大報壇，即天下列國之所無也，可以永有辭於千百代矣。」⁴⁵大報壇設立之初，就有表示正統的象徵意義，但三皇並祀之後，這種正統意義就更加強化。這也是歷代朝鮮國王重視大報壇祭祀的內在深層的原因。其二，申朝鮮尊周之誠。尊周思明通過大報壇崇祀，從此制度化、經常化了，崇祀三皇的意義較之崇祀一帝要大得多。崇祀一帝可謂一帝一事，而三皇雖然表面上是太祖、神宗、毅宗三帝，實際上他們代表的是整個明朝。太祖是明開國之君，這也是英祖力求說服朝臣同意共同崇祀太祖的原因。這樣象徵意義就更大，也更加體現出朝鮮尊明尊周思想。由一帝而三帝，大報壇崇祀實現了質的飛躍，而禮義上帶來的變化亦有不同，下面略及之。

三皇並祀與皇壇之變化

由獨祀神宗到三皇並祀，大報壇自然要重修擴建。而相關崇祀禮節也有變化，禮節更為隆重，更重要的是從其崇祀禮節中反映出尊周崇明的意義。處處圍繞著尊周崇明來設計，而祭祀儀禮中這種象徵含義就更為明顯。下文略作分析，以見其意。

⁴⁴ 參見JaHyun Kim Haboush, *A Heritage of Kings*, p. 24。

⁴⁵ 《李朝英祖實錄》卷69，英祖25年3月辛未，頁61；卷8，正祖3年8月甲寅，頁262；《國朝寶鑒別編》，卷9，頁334。

大報壇之變化

崇祀三皇議定後，英祖親製其圖，以一壇分三壇。但隨後改修大報壇時，仍然是一壇，並非三壇，只是將規模擴大了。由工曹判書趙觀彬、禮曹判書李周鎮和戶曹判書朴文秀督責大報壇擴建工事，費時兩旬即竣工。〈大報壇重修後小識〉曰：「粵在甲申，設壇禁苑，……而今因三皇並祀，恢拓壇壝，曰更增其高，釐正九級之制。而神座神榻，一遵皇朝舊式，並為重修。建三間淨室於壇東餅幔臺之傍，而名曰奉室。」⁴⁶大報壇原是倣社壇之制，高四尺，方闊二丈五尺。英祖重修時，將壇增高一尺為五尺，廣增一丈四尺，為三丈九尺，縱增五尺為三丈。將大報壇加寬加高，祭祀時則設三黃帳房，以安三帝神位。

黃帳房依《大明會典》圖式，「即幄座之制」。上覆黃幄，加以長梁，橫亘中屋脊，如屋制。幄之三面繞以黃帳，只開南向，又內隔二小帳，及壇之半。「略倣同堂異室之制」，中立二高柱，植於獅蹲之上，上綴隔帳以承長樑，幄上覆以油幕，幕上又覆以布幕，並撐以竹竿，引以麻索，釘於地上，藉以加固。幄內設神榻，榻上設神座位。太祖位在西，神宗位在中，毅宗位在東，皆坐北向南。⁴⁷三帝神位即安於黃帳房內，以「同堂異室之制」祭之。可見並非三壇，而是一壇三帳。其祭祀所設立的神位，並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昭穆制度。昭穆制度是將祖先神位置於中央，而子孫牌位則按照左昭右穆的原則，分置兩旁，而太祖神位永不改變，其他則按親盡則遷的原則，存放於大殿的東西夾室。對於大報壇三帝位置如何擺放，英祖與大臣首先亦考慮了昭穆制度，但以太祖為中心也並不符合昭穆制度，因為太祖與神宗、崇禎二帝輩分相差太大，又不崇祀三帝以外的其他皇帝，故而昭穆制度不合適。於是最後決定用「同堂異室」之制，設黃帳房以置其神位，從而解決禮節上的難題。⁴⁸正如馮爾康指出的，大報壇雖為壇，但並不排斥廟制，可以說是壇制、廟制結合一起而成的。

除黃帳房外，尚有壝、宮牆、奉室等等輔助建築。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祖時將敬奉閣移於奉室西牆外。敬奉閣原在槐院近處，乃仁祖以後珍藏明朝遺物之所。肅宗時將明朝所賜蟒衣、寶章及御製御筆、御畫等藏於敬奉閣，英祖親製《感皇恩編》，亦置於敬奉閣。敬奉閣與萬東廟之煥章庵一樣，成為朝鮮儲存明朝遺物之所。正祖年間，因「院廡頹圯，而巍然一閣在路傍，甚妨於觀瞻」，於是就將它移置於大報壇西牆。閣在皇壇西邊，揭敬奉、欽奉兩扁於閣之內外楣，皆英祖所書。安小櫃於北壁，奉安《追感皇恩編》二卷，皇朝賜寶印一本、太祖高皇帝御筆障子一、宣宗章皇

⁴⁶ 《朝宗巖文獻錄》，頁24。

⁴⁷ 《大義編》，頁27。

⁴⁸ 參見馮爾康：〈朝鮮大報壇述論〉，頁125-26。

帝御製御筆障子一、毅宗烈皇帝御筆御畫障子各一，御筆刻板二。⁴⁹ 將敬奉閣移置於大報壇，就如同珍藏明朝遺物的博物館，大報壇真成為明朝的象徵。

崇祀之禮節及其象徵意義

朝鮮大儒成海應(1760-1839)曰：「壇享之初雖用祭天之禮，壇制倣社壇之故，儀式多從之。」大報壇乃倣明朝祭天之禮，而其儀式又多類社壇。祭祀有一套嚴格的禮節，最初是參合明朝禮儀與朝鮮禮儀而製定一套禮儀制度。肅宗時期，禮曹判書李頤命認為杞宋猶用夏殷之禮，況我國之於皇朝乎，即便《大明集禮》中有不合朝鮮風俗者，亦當從之。肅宗採納其主張，認為：「斯禮也，即神宗皇帝平日耳目之所熟習，而嘗用於宗廟丞嘗者。」⁵⁰ 故肅宗朝祭祀時就有意採用明朝禮儀。

英祖時期對崇祀禮節相當慎重。對於祭祀禮節，英祖有許多疑問，皆一一詢問朝臣，力求使禮節中規中矩。最後，禮節規範皆依從《大明集禮》。祭祀用牲，或曰用黑牛，或曰用黃牛，趙明履以為：「明以火德，故當用騂牛，而騂為深黃色，黃近於騂，故用之以黃也。」金在魯贊同其議，於是祭祀時就用騂牛。

肅宗定大報壇樂制，有鑒於中國古代天子用八佾舞，作為藩國的朝鮮則只用六佾舞，以示尊重。英祖十七年(1741)，又親製大報壇祭禮之樂器。大報壇祭祀原無樂器，只用山川祭樂器用於壇祀，英祖十七年三月大報壇祭祀時，先有蠶祭，山川樂器要先用於蠶祭，然後才可能施於大報壇，影響了大報壇的祭祀，於是就決定造大報壇樂器。九月即告成，以後大報壇祭祀就有專用樂器。

祭祀時間，定在每年農曆三月十九日大祭，乃崇禎皇帝自盡於煤山之忌日。對於這個日子，亦是經過多次討論而定的。最初定在每年正月上旬，但禮曹判書閔鎮厚認為：正月廟社大享及朝賀俱為相值，壇享恐難每每親行，借二月東州狩之義，將以二月行之，亦有嫌於中祀，「定以三月，皇朝不血食在於三月故也」。後來又有改變，「一年一行之祭，不拘孟、仲朔者，以郊祀行於十一月，私家上墓在於十月，傍照行之。天神卜辛，人神卜丁亥，以此兩日參用」。⁵¹ 英祖二十七年(1751)開始，方定凡三月十九日毅宗忌辰、五月初十日高皇帝忌辰、七月二十一日神皇忌辰，皆行望拜禮。

至於具體的禮儀有多種形式，若「親臨誓戒儀」、「攝事時受誓戒儀」、「取明水火儀」、「紙位書寫儀」、「親享儀」、「王世子攝事儀」、「大臣攝事儀」、「特行望位禮儀」等等類別，不一而足。在諸多禮儀中，以國王親享儀最為重要，若國王臨時有病或

⁴⁹ 《李朝正祖實錄》卷52，正祖23年7月辛巳，頁523。

⁵⁰ 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圖書影印第十一號(漢城：旴晟社，1982年)，卷31〈壇制論〉，頁289；《尊周匯編》，卷6，頁476。

⁵¹ 《李朝英祖實錄》卷73，英祖27年3月丙辰，頁124。

因故不能親享，則遣王世子或大臣代行其禮，故又有王世子攝事儀和大臣攝事儀。其祭祀儀式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具體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取明水火儀。因為祭祀明朝皇帝，故而祭祀時特有一禮節取用明朝水火，祭祀時要用潔淨的明朝之水、明朝之火，不能用一點非大明的東西，以示不用大清之物。因為當時朝鮮為清朝藩屬國，故皆有清印記，須用特定儀式不能得明朝水火。這一儀式既表明它承續了明朝以來的祭禮，又暗含「大明日月，獨照我東」之意。其二，祭祀中明遺民後裔與朝鮮忠烈之後受到相當的重視。朝鮮是個極其講求身分等級制度的社會，有兩班、中人、良人、奴婢四個等級，兩班階層居於社會最上層。而所謂忠臣後孫多非兩班子弟，明遺民子孫在朝鮮社會地位就更低了。雖然肅宗以後對這部分人相當重視，一再提高其社會地位。這也說明當時其社會地位不高，唯其社會地位不高，所以方才需要提高。但在祭祀中明遺民後代子孫、朝鮮忠良子孫都比兩班官僚階層地位更為尊貴、更為重要。即以國王親享儀為例，行祀之日，明遺民後孫、忠臣子孫及文武百官先期至壇，排好陣列，等待國王、王世子前來；但排列時，「北向，設陪享官位，忠臣後孫及文官一品以下於冽泉門內道東，每等異位，俱重行北向；西上皇朝人後孫及宗親武官一品以下於冽泉門內道西，當文官每等異位，俱重行北向」。明遺民後裔排在宗親及武官之前，忠臣後孫排在文官之前。而祭祀結束，離開之際，又如斯排隊，先由國王離開，再世子，然後「皇朝人後孫及忠臣後孫，宗親文武百官以次出」。⁵² 明遺民後孫是緊隨王世子出場的。而祭祀之中行禮，亦由明遺民後孫帶頭。祭祀中，明遺民後孫是僅次於國王和王世子的地位，顯得極其尊貴，是最為重要的陪享人員。雖然明遺民社會地位不高，但在大報壇祭祀過程中，其尊貴則無以復加。由此更凸顯大報壇的意義，以及大報壇祭祀與明朝的關係。其三，這是當時朝鮮規格最高的祭祀，也是朝鮮當時最為重要的祭祀活動。國王親享時，先得齋戒數日，以示誠心。上自國王，下及宗親文武百官都得參加，相當隆重。其用六佾舞，用的祭品是太牢，牛一鼎、羊一鼎、豕一鼎，供奉三牲。三皇神位只用紙寫好，祭畢，焚燬不用。祭祀禮節，肅宗時草創，一切皆依《大明集禮》，用明之儀式，英祖時加以完善和發展。以後就為朝鮮歷代國王所沿用。

綜上所述，大報壇由獨祀神宗到三皇並祀，壇制有所變化，得以增高增闊。而與此相關的祭祀禮節亦得以完善，在崇祀禮節中，打破了等級社會的界限，將社會地位並不高的明遺民後裔和忠臣後裔置於僅次於國王、王世子的位置，高於宗親和兩班官僚，這真是非常獨特之處，從而凸顯它與明朝的關係，其「大明日月，照此一域」，即此意也。

⁵² 《尊周匯編》，卷8，頁35，55。

結語

由宣武祠、武烈祠崇祀明朝東征將領，到肅宗建大報壇崇祀明神宗，最後英祖將大報壇推及明太祖、明崇禎帝，這是朝鮮王室感恩思明思想發展的結果。宣祖時期崇祀明東征將士是為了感恩，肅宗建大報壇也是為了感恩，而英祖依然將這種感恩推及明太祖、毅宗，感恩思報成為大報壇創立發展的最直接的動因，而這種思想又為其後歷代國王所繼承和發揚。而大報壇的祭祀也為其後繼者們所堅持，一直到1908年迫於日本人壓力停享。在感恩崇報的過程中，朝鮮借此加強與明朝的聯繫，確立其承繼了明朝以來的中華正統，從而解決朝鮮現實政治中的正統危機與矛盾。

我們從上面對大報壇設立時的爭論過程看出，國王比朝臣對崇祀明朝皇帝更為熱切。大報壇從設立到擴展，都是經過國王肅宗與英祖同朝臣三次大的辯論後，方才付諸實施。這固然反映出國王對明朝比朝臣更為重視。更為重要的是，朝鮮國王面臨清朝取得中原王朝的統治地位，對其原來所信奉的中華正統給以極大的衝擊，國王不可能從清朝得到其統治的合法性，因為這同它所堅持的儒家義理觀相違背。作為藩國的朝鮮，唯有強化與明朝的關係，通過對明朝皇帝的祭祀，表明其正統性由來已久，而且是得到中華正統王朝明朝的確認，以確立和強化其自身的正統地位，強化其統治基礎。這是歷代朝鮮國王重視崇祀明朝皇帝，強調尊周思明的背後深層的原因。朝臣反對並非認為不該崇祀明朝皇帝，而是憂慮禮節上與現實中的困難，但在國王的堅持下，最後朝臣盡皆附和，把相關的問題一一克服。在對大明皇帝的崇祀中，朝鮮找尋到自身的正統性。

「尊王心法，列聖相傳」。由仁祖到肅宗，各位國王都設法講求尊明義理，發展到肅宗時期終於建成了大報壇，崇祀明神宗；而到英祖時期，更擴展到明太祖、明崇禎帝，三皇並祀，而且又由中山武寧王徐達、寧遠伯李如松和文貞公范景文從享，使大報壇真正成為一個崇祀明朝的祭壇，由一帝而三帝，並及三大臣。所謂「大明餘派，偏寄我東」，朝鮮為「大明天地，崇禎日月」，大報壇成為實實在在的明朝的象徵。隨後正祖、純祖、憲宗、翼宗、哲宗莫不謹慎從事大報壇的祭祀活動，崇祀以尊周，崇祀以尊明。對大報壇始終相當重視，正祖作詩頌道：「江漢朝宗萬裏濤，皇恩浩蕩注麟毫；唐堯併立山河鞏，周稷重光日月高；草木皆知今鰈域，風雲猶帶舊龍袍；昭回北苑瞻新構，百世吾東奉赤刀。」翼宗(1835-1849在位)詠大報壇道：「匪風思古帝，何處是中原；內苑三壇屹，千秋感舊恩。」哲宗(1850-1863在位)亦有詩詠大報壇：「大報壇高日月明，顧瞻周道砥如平；齋居肅穆洋洋在，寓慕風泉百感生。」⁵³ 翼宗、哲宗是朝鮮晚期的兩位國王。他們對大報壇祭祀尚且如此熱誠，對大

⁵³ 英祖四十年〈英祖大王御制御筆聯句帖〉領府事申晚言，見《朝宗巖文獻錄》，頁57；《朝宗巖文獻錄》，頁24；《翼宗文集》，《韓國學資料叢書》第17集(城南市：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8年)，卷3〈小西齋齋居感賦〉，頁45；《朝宗巖文獻錄》，頁75。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27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孫衛國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報壇的意義還是如此熱誠地讚頌，真可以說思明感恩、尊周義理是朝鮮王朝世代遵循不替的家法，而借此「家法」，宣示其承繼明朝的中華正統，從而鞏固其王朝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總之，朝鮮以大報壇祭祀明朝皇帝達二百年之久，崇祀明朝皇帝，即是對清朝的一種反叛，是朝鮮尊明反清最集中的體現。由此可見，朝鮮對待清朝是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表面上作得相當謙恭，謹守藩邦職守，但內在心態上從未認同過清朝的正統，永遠視之為夷狄。如果考察清韓關係時，能夠看到朝鮮尊明反清的文化心態及其對清韓關係的影響，我們就能更深層地把握清韓關係的內在實質。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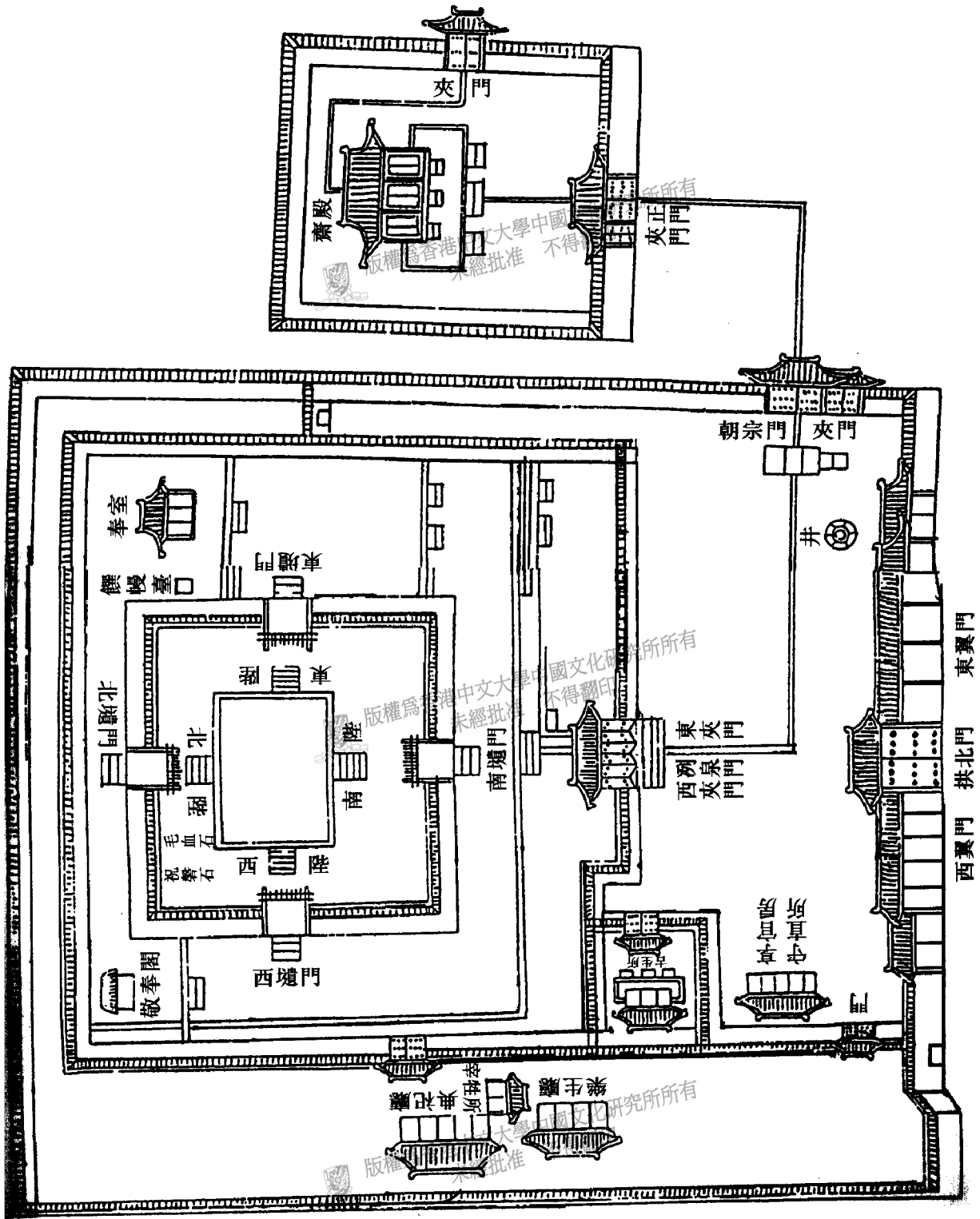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試論朝鮮王朝大報壇創設之本末及其象徵意義

大報壇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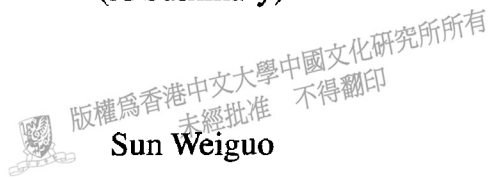
(參見《尊周彙編》卷八，頁6-7)





A Study on Choson Korea's Dabaotan: The Reasons and Process of Its Found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A Summary)



Sun Weiguo

Choson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tributaries of Ming China since Choson regards *mohwa* 慕華 (the admi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adae* 事大 (the recognition of China as its suzerain state) as its fundamental attitudes to Ming. Moreover, Choson is in a deep gratitude to Ming since Ming defended and rebuilt Choson from Hidiyoshi's invasion. At the same time, Choson tried to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 with Ming by respecting Zhou and longing for Ming even after Choson became a tributary of Qing. The founding of Dabaot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amples of "Choson's longing for Ming and belittling Qing" since three Ming Emperors had been offered sacrifice there for about two centuries. The sacrificing to the Ming Emperors is not only a signal of Choson's gratitude to Ming but also the sign of Choson's succeeding to Ming's Chinese legitimacy. By studying the Dabaotan, we can apprehend Choson's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aspects of its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Qing: politically, Choson is one of the typical tributaries of Qing; but culturally, Choson considers the Manchus barbarians, and it belittled Qing dynasty. We cannot outl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Qing and Choson unless we understand th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aspects of Choson's attitudes to Qing.

